

· 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 ·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四） ·

何谓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理论内核到革命策略

王庆丰¹ 周子薇²

【内容摘要】 发达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破坏的空间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地理扩张”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空间生产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但也造成了“空间剥削”，引发了以现代性城市危机为主的“空间危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策略是具有总体性变革意味的“城市革命”，其目标是建立起具有真正差异性的“取用性空间”。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不过，其理论内核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结构，其革命策略也仍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

【关键词】 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空间剥削 空间矛盾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作者】 1 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2 周子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主体性原创性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研究”（25JJD720003）

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时间与空间逐步被纳入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逻辑，沦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手段与统治工具，于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内蕴着“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奴役与压迫的生存状况，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揭示了资本家为最大限度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呈现出全面的“加速主义”趋向。“剩余劳动时间”“工作日”“加速主义”等概念共同构成了“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线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必然形成“世界市场”，它通过



殖民掠夺、商品倾销、资本输出等方式剥削落后国家，形成依附性发展格局。发达资本主义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成为生产对象。“世界市场”“殖民地理理论”“空间生产”等概念则勾勒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轮廓。可见，“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两个重要维度。普殊同、罗萨、韩炳哲等代表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时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径，而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则代表了对发达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径。本文着力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维度去考察、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实施创造性破坏的空间生产、制造消费社会的商业景观、重塑都市社会的空间结构、推动对外贸易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虚拟平台的数字空间等诸多空间策略，不仅维系着资本主义的存续，甚至实现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繁荣。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我们应从空间维度的现实表征中剖析其深藏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如此方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更具洞察力与穿透力的考察，进而推动构建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批判理论。

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自行增殖的价值”，^①“价值”成为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源于他对“商品”概念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商品与劳动产品的首要区别在于商品必须用于交换，“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②不同质的物（商品）之间要想交换就需要转换成相应的价值量。“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③价值量的衡量标准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非个人生产时间。随着交换的普遍化和规模的扩大，抽象的人类劳动在现实世界以货币作为量的表现形式。由此，货币量的积累成为价值增殖的结果和目的。

资本家为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必然将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到其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从而尽可能榨取更多绝对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即使能够挣脱来自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约束，也无法逾越工人的身体界限，因此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始终有限度。于是，资本家就不得不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以赚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在生产领域，机器大工业的采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流通领域，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减少了流通成本、缩短了流通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短了商品的生产时间，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善缩短了商品流通时间，这为资本家攫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但这仅是资本主义“时间政治经济学”实现资本增殖的外在策略。资本主义还通过“时间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策略——改变资本的形式——实现财富的急剧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息资本具有区别于其他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特有的性质也正在于此。”^④一般资本只是在生产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而生息资本却可省略实际生产过程，似乎以完全不受生产时间制约的方式实现价值的自我循环与自行增殖，其资本总公式从“G-W-G”变为“G-G”，商品生产与流通所需的必要时间被极大缩减，因此生息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第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



的增殖也被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盗窃了上帝的时间”。然而，生息资本只是制造出了财富增殖的幻象，它实际上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财富。以上论述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基于时间维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但是，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和批判不能仅从时间维度考量，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应当从空间维度进行考察。列斐伏尔是从空间的视角看待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分配的，并明确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①哈维曾指出，生息资本（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取得霸权地位的同时，把空间也纳入了其增殖的逻辑轨道。“在这整个体系中，生息资本的流通扮演了霸权的角色。货币资本会在生产和实现的各个侧面持续地施展自己的权力，同时把空间配置也带进了自己的轨道。”^②对空间维度的考察绝不意味着要取代时间维度，而是要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哈维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的意义以及创造人类事物新的空间结构的推动力，只有与这种时间需求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被理解。‘时间消灭空间’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空间维度变得无关紧要。而是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空间如何以及怎样能够被利用、组织、创造并被支配，来适应资本流通更为严格的时间要求。”^③

实际上，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问题时，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在时间维度的持续加速策略，其论述中也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在空间维度上的持久的空间生产策略。空间不同于时间的关键在于，空间可以被人反复使用与改造，具有永久性变革的内在属性，而人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尽可能完成相对多的事情。同理，相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在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来，资本家持续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建立与重构资本主义空间结构、持续构建人为制造的“第二自然”^④的过程。事实上，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资本家就是通过彻底改造空间结构完成原始积累的，这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地主以血腥暴力的方式掠夺和占有土地，促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相互分离。在此基础上，现代化工厂制度得以建立，资本主义构建了区别于以往的、独特的空间结构与空间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技术角逐也促使机器设备与劳动力持续更新，空间组织形式与空间结构也相应改变。此外，交通运输工程的建设与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持续有力地消除着资本增殖过程中的空间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空间集中与整合。城市化运动随之兴起，城市化不仅包括生产场所的空间生产，同时包含诸如医院、学校、商场等与生产相配套的消费生活场域的空间生产。在空间结构持续调整变换中，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当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经济危机，陷入经济大萧条时，当代资本主义常采取“空间修复”策略，以寻找新的有效需求，推动资本主义重新繁荣。资本主义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性支出来进行时间性转移，这种策略表面上看是一种时间策略，但实质上是通过修建道路、桥梁、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以重构空间结构的方式来组织再生产。归根结底，它是一种空间性的修复策略。由于地理空间有限，资本主义必须进行创造性破坏，即对过去的建筑进行改造甚至推翻重建。“这当中的运作方式是：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资本对所在的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⑤创造性破坏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资本主义一直试图创造一种地理景观去促进它在某一时刻的活动，然后在另一时刻不得不破坏这种地理景观，构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以容纳它对无限资本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的破坏被载入了资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01—202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608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④ 此处的“第二自然”是相对于“第一自然”而提出的概念。“第一自然”是指原初的、未经人工改造过的自在的自然世界。而“第二自然”则是指经过人工改造的自为的自然界，亦可称为“人工自然”或“人造空间”。

⑤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68页。

本积累的真实历史地理学的景观之中。”^①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策略是在内外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的。外部空间策略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地理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是一种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主义“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以及其他地方的社会 and 劳动可能性”，^②找到新的有效需求并攫取超额利润。地理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资本主义通过扩展领地，将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化，不断重新开始原始积累。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我们所见，成熟期的资本主义必须在各个方面依赖并存的非资本主义阶层和社会结构”。^③也就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空间，更重要的是依托于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的外部空间。在此意义上，“对外贸易”实质上输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被不断复刻。但是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同样具有内在悖论，它一方面需要外部空间带来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全部外部空间内部化。通过空间策略，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之后走向衰退，反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在早期资本主义还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增殖的时间逻辑与空间逻辑一直相互交织、彼此支撑，共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审视发达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双重视角。

资本主义的空间剥削与空间危机

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已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现在空间已经进入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领域；它和财产有了关联——这一点非常清楚——和交换、组织机构、文化、知识都有了关联。空间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因而空间不再处于传统分类所规定的水平或层面上。（社会）空间概念以及空间本身，因此逃脱了‘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上层建筑’这样的分类法。”^④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成为商品，城市则成为财富增长的机器。在城市中，本该全体民众共享的要素——空气、光、水等自然物变成稀有品，“匮乏”的“自然”被转化为新时代的“垄断地租”，“土地”概念也被打造为甚至可以说是偷换为“地产”概念，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明码标价，以看似绝对公平的方式售卖：一方面将资产阶级的生态特权伪装成消费能力差异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使穷人将居住水平低的缘由归结于自身没钱“买不起”，“自愿”放弃了空间所有权。城市空间呈现出以价格为划分标准的中心与边缘、宁静与喧哗、干净与脏乱、繁荣与破败的两级结构。资本家还通过修建高档社区、开设咖啡馆、举办艺术展等方式划分城市阶层，建立空间区隔，设置阶层壁垒，甚至以“治安管理”的名义将特定群体排除在外。空间不仅是居住、休闲、社交的场所，更成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城市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高档小区、豪华写字楼这些建筑本身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持续制造着对富裕生活的“仰望”与“期盼”，使人们沉浸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中，进而更加卖力地从事生产劳动。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看似公平正义的城市规划，将政治权力机构与具有商业功能的建筑安排在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那么，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空间就将一直被挤压至边缘区域。发达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巧妙地剥夺了居民平等享有空间的权利，对城市居民实施着柔性的经济控制。

①② 戴维·哈维：
《新帝国主义》，
付克新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9年，第
59页，第64页。

③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
董文琪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363页。

④ 亨利·列斐
伏尔：《空间的生
产》，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2022年，第
XXIII页。



空间的原生态在消失，空间都成为同质化空间，空间的独特性逐渐丧失。城市中的商圈、霓虹灯、网红打卡地等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景观，不断吸引人们的眼球，刺激人们的感官。就连所谓的原生态“自然风景”也被开发为“自然景观”。摆渡车、缆车、滑道、美食街和购物街区、悬空玻璃廊桥等几乎成了所有景区的标配，旅游产业中的休闲和文化产业都成了资本所塑造的现代化景观。实际上，居住空间、工作空间、学习空间和休闲娱乐空间，甚至包括各种号称是原生态的空间，都不过是资本塑造出来的“社会景观”，是一系列同质化的景观，现代社会成为“景观社会”。资本主义以强大的同质性力量弥平了空间的差异性。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进步，数字化网络的出现与勃兴，资本主义生产出一个超越现实空间界限的完全虚拟的赛博空间。作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全新据点，“在没有新大陆可去的当下，元宇宙构成了‘虚拟的外部性’，成为资本眼中新的香喷喷的处女地”。^①元宇宙引发的资本狂欢便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典型和极致的产物。在数字空间中，数字平台通过收集用户浏览、关注、点赞、收藏与购买等行为的数据，完成关于用户喜好的精准算法分析。更为重要的是，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量等数据表现能够直观展现出其社会价值与社会关系，于是人的消费理念、情绪控制、情感选择、价值体系等精神领域的活动都“遭遇”数字资本主义的掌控与洗礼。在其中的人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冰冷且麻木地展示自己，消耗自己，又不断生产自己，整个生活世界变为资本生产的数据工厂。如德勒兹所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②人的肉体、情感乃至精神都被数字资本主义装置这一庞然大物所“座架”。人（工人）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的“赤裸生命”变为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目了然”的“透明生命”。身体不再是人的主体，而成为被经营的商品。此时的人不是“鲜活的生命”，而是彻底沦为“僵化的机器”，独立的自由个性被完全剥夺。号称推崇个性化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打着保护私密空间的旗号，实则旁若无人地入侵私人领域，并将其无情剥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私人领域完全被曝光在公共领域之下，成为娱乐大众的消遣品。

资本主义借着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名义而实行的空间规划，实则是进行空间剥削，其结果是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对立。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从城市阶段过渡到大都市阶段之后，城市空间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承载着两极分化的内部矛盾。城市化进程只是打破了原有的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而不是彻底改变这一空间结构。发达资本主义通过破坏性的空间生产重塑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强化了贫富之间、阶级之间固有的空间壁垒。现如今，城市空间结构所蕴藏的两极分化的内部矛盾依旧十分深重，致使聚居在城市中心的某些少数族裔“因此被隔离在新的繁荣之外，并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他们的反抗，进而产生了人们所说的‘城市危机’”。^③这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化了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的中心的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分裂了。”^④

空间逐渐具有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一种用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⑤空间不仅作为商品，展现出商品拜物教的属性与作用，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履行着意识形态职能。资本主义在城市内部推行流行文化，赋予

① 吴冠军：《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111页。

②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9页。

③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

④⑤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89页，第203页。

冰冷的建筑、广场、街道乃至园林绿化以深刻意义，形成一道道看似差异十足，实则同质化严重的文化陷阱与文化壁垒，进一步模糊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在全球范围，资本主义则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其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

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试图打造的是区别于以往的“新殖民空间”，它不仅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殖民，更是资本权力对全体民众的生活殖民；不仅是物质殖民，更是精神殖民。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试图完成对个人的自然空间权利与社会空间权利的全面剥夺。资本主义想要塑造的就是能够实现资本增殖的同质化空间，在其中不断注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造出以空间商品化、资本化为底色的“空间拜物教”，以此掩盖空间生产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进而不断实现全方位的隐秘控制。实际上，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的空间剥削被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深深遮蔽。进一步而言，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拜物教”。“空间”发挥了列斐伏尔所谓的根本属性，成为政治性、策略性的工具。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危机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城市不再是属人的城市，而是被资本控制的城市，城市本身产生了空间异化危机。二是城市居民对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感以及对城市家园般的归属感逐渐“丧失”，从而造成城市居民的存在主义危机。三是由于居住空间的隔离和分化，城市空间中的内部矛盾被不断激化，甚至出现城市暴动，城市无法一直处于安定和谐的状态，最终会导致城市居民的分裂对抗。城市居民仿佛退化为遵守丛林法则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难以维系，阶级对抗在城市空间布局中表现为富人区和贫民窟的空间对抗。城市本身失去了原本温情脉脉的家园体验，表面上看来是冷冰冰的建筑群，被社会建构成了一个充满无情竞争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的功能不再是满足人类生活的居住空间，而是沦为资本增殖的机器。

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模式被推广，资本主义的空间剥削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深化。全球空间被凝练为一个巨大的“星球城市”，实则依旧遵循着城市内部的空间格局与等级制度，“世界的城市化和相关的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热带雨林将被摩天大楼和工厂覆盖，而是说整个世界将被纳入一个都市的等级制度当中，一个以都市为中心的多层次网络——字面意义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从巨大的元都市延伸到最小的都市居住点”，^①这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状况。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不平等的空间分配将始终存在，空间危机的隐患也会一直存在，终有一日，“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无法掌握这个它们生产出来的混乱、充满矛盾的空间”，^②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的爆炸”必然出现。哈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空间危机：“中心剥削外围，都市剥削偏远地区，第一世界压制并冷酷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是从外部强加的，如此等等。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了外围的社会形态与压迫的中心来源之间的斗争。乡村针对城市进行抗争，外围针对中心进行抗争，第三世界针对第一世界进行抗争。”^③资本主义最终将引发全球范围内难以化解的空间危机。从空间维度思索反抗资本主义，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可能性路径。在此意义上，“空间”概念彰显着它的革命意蕴与未来属性。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策略

发达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以城市规划为幌子，实际上是将“空间”变成商品，从而剥夺了无产阶级平等享有空间的权利，塑造出相较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更具政治性的“空间拜物教”。

① 爱德华·W. 苏贾：《我的洛杉矶——从都市重组到区域城市化》，强乃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0页。

②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669页。



空间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属性。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以一种空间区隔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从而加剧城市两极分化，激化内部矛盾，酿成难以化解的城市危机，即“空间危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揭示这种“空间剥削”和“空间危机”，更重要的是从空间视角寻找一种有效的空间革命策略，由此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空间。

资本主义城市成为“在资本流通的时间进程中被雇佣的劳动力所构建的生产力集聚体。它从服务于世界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陈代谢中汲取养分，并依靠在其范围内组织的高度复杂的生产与分配系统维持运转”。^①资本主义城市不仅是空间生产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甚至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装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城市空间出发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契机与未来空间，即“城市革命”。他们认为“城市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掌握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权，将城市权利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手中归还给全体民众，消除城市中不平等的空间分配，使城市空间为全体居民共享。获取“城市权利”或“城市权”成为“城市革命”的核心要义。列斐伏尔作为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者，指出“城市权利”表现为“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globalité）。这不是一项自然的权利，当然，也不是一项契约性的权利。用最‘现实’的术语来说，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权利，还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网络与流通中出现而结成（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团体的权利”。^②这意味着城市权利并不是一种泛泛的、具有普遍性原则的集体权利，它应当是为每个个体所享有的差异化权利。城市居民具有自主建设城市、享受城市生活的权利。归根结底，城市革命就是要恢复使用价值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由城市居民掌握其所在城市空间的使用权，实现空间正义。从争取城市空间控制权与使用权、保证城市居民享有城市权利的角度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革命”主要有两条路径，即暴力的路径和文化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沿袭马克思以劳资矛盾关系为斗争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沿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暴力对抗方式，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权及其权力运作方式进行限制乃至颠覆，将空间从维持资本积累的机械工具转变为彰显社会公平的能动载体，从而获取城市权利，即实现空间正义。“空间正义包含城市权利理念以及相关的差异和抵抗的权利。”^③城市革命与传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区别一方面在于城市革命更侧重于将城乡、中心-边缘等地方尺度作为具体革命地点，进而从关系性视角延伸至全球；另一方面则在于革命主体有所扩大，打破了传统阶级政治的固有限制，整合了种族、性别、环境等多元诉求，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反抗力量。城市革命主体具有充分的多样性与广泛性。城市中的工人、贫民、知识分子、社群等所有对资产阶级心生不满者都可以结成联盟，由潜在的革命力量化身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

第二条路径是以文化因素为代表的日常生活革命。在列斐伏尔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新”体现在传统物质性劳动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已经逐渐被非物质劳动取代，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蓄力点不再是工厂，而是城市，更确切地说是“都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浸润到城市日常生活中，在非劳动时间的休闲空间生产处得到最为鲜明的体现，“非劳动时间构成一部分社会时间，非劳动时间作为投入生产（把生产能力卖给掌握生产工具的人）的时间的补偿。像劳动一样，非劳动甚或非劳动时间构成一部分生产方式。非劳动推动经济——首先，因为非劳动时间是消费时间；其次，因为有了闲暇时间，就形成了旅游、休闲业、会展业、‘文化’和文化产业及其大量生产部门，它们制造产品，产生剩余价值”。^④空间生产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紧密联系。消费文化、休闲文化、精英文化等制造出的文化产品成为资本主义城市

①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50.

②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4页。

③ 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④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53页。

日常生活中空间生产的重要着力点。于是，围绕文化因素的日常生活革命尤为重要，它旨在重拾城市空间的创造性潜能，力求在思想上剥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建立起全新的生活方式。其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哲学精神中的哲学的实现。”^①在此革命中，列斐伏尔等将“知识革新”“话语斗争”视为重中之重，着力构建一种能够正确映射政治诉求、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话语范式，建构正义的空间生产知识体系。正义的空间生产知识强调开拓具有差异性且开放多元的“第三空间”——一种融合物理空间（第一空间）、精神空间（第二空间）的辩证统一体，从而打破中心-边缘控制式的空间格局与思维模式，更好地容纳诸如边缘群体等形形色色的空间力量，为创建非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提供可能性。

“城市革命”一方面致力于引发个体革命性的“空间意识”，在城市空间范围内掀起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激进空间实践，用暴力手段摧毁同质化的外在空间；另一方面又从破解资本主义的同质化逻辑的角度试图论证如何生产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具有真正差异性的内在空间。这也恰恰彰显出“城市革命”具有理论革命与实践革命相结合的内在特性，深层凸显出社会变革的“总体性”意味，“然而理论实践能与革命实践区分开来吗？不太可能。只要人们不把‘革命’当作暴力，只要人们扩大革命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最深刻的趋势超越世上矛盾为依据而进行的世界改造，就不需要强行将理论实践与革命实践区分开来。日常实践本身并未逃离含糊性。它同时具有压迫性与革命萌芽。至于总是因为专业化而实施简化并受到简化的局部实践（包括活动本身与专门的理论活动），它们必须始终进行自我批判，进行相互批判，从而超越它们的局限与分歧。像这样，也只有像这样，总体性才能运作起来，也就是整体实践与转型后的合理性双方同时进行的形成与成形过程”。^②

城市革命的这两条路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结合的，因此，城市革命是一种总体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暴力革命的革命主体形成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面临更大的挑战；“文化的革命”侧重于展开新生活方式的指向性，反而比较容易开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性的“城市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全新探索。总体性变革的城市革命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否定了资本对空间生产的控制，如何打造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之后的“新”城市空间成为关键问题。

新的城市空间要摆脱市场、利润、资本的隐性操控，彻底改变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空间的“产品”属性，转变为人们共享的“作品”，成为充盈着“另类”生活方式的场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告别了由交换价值决定的空间私有化逻辑，致力于服务使用价值与集体生产，满足城市居民的合理需求，使城市居民能够以“邻里分散化”、都市自我管理、共有空间治理等民主自治方式掌握城市权利。也就是说，未来的城市空间不再是过去被政治与资本所掌控的支配性（dominated）空间，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具体的、差异性的、使用价值居于主导地位的“取用性空间”（appropriated space）。真正的差异性空间、“他者空间”需要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不断生成。

在列斐伏尔看来，具有差异性的“使用价值”的最大来源在于“自然”与“身体”。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更深层地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地方、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制造源源不断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将具有“特殊主义、忠诚情感、相对固定的地方空间”作为抵抗资本同质化统治的阵地，生产出具有“场所精神”的差异空间，才能打破同质化空间。所谓“场所精神”是一个源自古罗马的概念。根据古罗马的信仰，每一个“独立的”存

①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Press, 2024, pp.207-208.

② 亨利·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米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第250—251页。



在都具有自己的精神特色。这种精神使人和地方具有生命，伴随着它们从出生到死亡，并决定着它们的个性或本质。具有场所精神的空间一定是具有独立性、差异性的空间生命，是对同一性空间的反抗。“这样看来，任务就是确定一个替代方案，而不是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这个任务就是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①哈维、列斐伏尔等空间理论的代表学者将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空间指向乌托邦想象。在他们看来，乌托邦并不指涉着一种消极、虚无、不切实际的意味，相反，乌托邦是充满希望的，是蕴藏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与想象的、能燃起人们对未来世界无限渴望的。“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主要区别在于，“异托邦”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点，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对未来世界所寄予的乌托邦想象，实际上不是一种空想，而是现实。

①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胡
大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6年，第
190—191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延续再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表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中必然包括有关空间思想的理论。这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会走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变化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无辜的，它们同人类的统治和控制实践相关。实际上，它们是根本性的框架结果——在其中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它决定着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常常是压迫性的）。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可能总是让这些问题悬在那里”。^②但是，如果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仅仅理解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单纯的地理学补充，抑或是革新时空观，甚至是建立关于“空间”的本体论，都是大大误解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者们的初衷，有可能降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明晰了马克思所隐含的空间意识，揭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旨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横向维度。正如苏贾所言：“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③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时间和空间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凸显了这一理论特质，综合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

② 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
异地理学》，胡大
平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52页。

③ 爱德华·W. 苏
贾：《后现代地理
学——重申批判
社会理论中的空
间》，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4年，第
68—69页。

虽然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理论探索，但是其理论内核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结构，其革命策略也依然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着重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探讨了空间剥夺与空间正义的问题，但空间生产只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使得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结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策略，否定资本对空间的控制，主张争取空间权利，建构真正的“差异性空间”，这种革命策略不仅达不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且只能陷入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中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反而能够为解决空间危机、实现空间权利提供一种可操作的、现实性路径。

编辑 张 蕾